

THE WORKER'S PUBLISHING HOUSE



在高墙内

梅志著

梅 志 著

在高墙内



在高墙内

梅志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怀柔燕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6.25 字数：90000

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,000册

ISBN7—5008—0370—2/I·100 定价：2.25元

目 录

雪花为我送行.....	(1)
真的是他吗.....	(16)
恐怖与混乱.....	(35)
生的转机.....	(48)
新的开始.....	(58)
剪不断理还乱.....	(68)
希望, 遥远的希望.....	(81)
晴天霹雳.....	(93)
参加揭发.....	(114)
在劳改医院.....	(128)
再进高墙.....	(152)
走出高墙.....	(174)
后记.....	(195)

雪花为我送行

自从1967年11月初F（胡风，下同）被带走后，我和他就断了音讯。他究竟在何处，没有人告诉我。我却一直滞留在苗溪茶场。先是在劳改医院洗血绷带，直到双手手指溃烂，才让我改做针线活。三个月后，军宣队的连指导员送我回“家”。那两间和F同住时的“家”，已全被贴上了四川省人保组的封条。我被安排在隔壁大院厕所旁的一间七八平方米大的小屋里。同时叫我开出窗前的一块土地，自耕自食，算是劳动改造吧。场部每个月拨回我应得的粮食和一张肉票。看守我的是“造反司令部”的一个队长，他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占了两座大院，养了几十只鸡。我就经常一人在屋前看着小鸡刨土、捉虫、打架，倒也是一种生活。

后来又陆续换了几个干部看守我。1969年

冬，场部通知我要我到别处去。临走前夕，我内已被结合到革委会的前书记夫人提出，今后我的生活将怎么办？因为留给我的那存折上的300元，两年来已所剩无几（在医院的三个月。我是自付伙食费而没有工作报酬的），到别处去我就拿不出伙食费了。这样，第二天书记夫人又通知我暂时不走了，等领导研究后再决定。我在那儿又耽了些日子。直到1970年8月底才正式向我宣布，在女二队劳动，按就业人员领每月21元的生活费。于是，我就到了山上女队劳动改造（他们说是锻炼）。

到1972年底，我在这个苗溪茶场犯人刑满就业队参加劳动已经两年多了。正准备在此过第三个新年。一天，我们正在地里砍菜，队部在准备杀猪，大家心里都为新年那难得的好饭菜而兴奋。忽然，有人从上面传下话来，说队部叫我回去，有事情。我就赶快收拾好还未砍完的菜，背着背兜向队部走去。

我刚走到台阶上，小厨房的炊事员就向我叫喊了起来：“快去给我弄点细菜来！来客了。”看我不理他，就很不高兴地恶狠狠地说：“听到没有？快下去弄菜来！”

这时，我发现坝子里停了一辆吉普车。我径直走进了办公室，那里除了队部的干事外，还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。他们很客气地叫我坐下，并问我最近生活怎样，家里有信来吗？我一一作了回答。其中一位，可能是负责人吧，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想调你去胡风那里。他不是已经70岁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我们看他年岁大了，想让你和他在一起，照顾他。我们是讲革命的人道主义的。你回去收拾一下就离开这里。”

另一位干部问我：“你有什么意见吗？”

我能有什么意见？我能告诉他们，我是多么地惦念着F、想和他在一起吗？过去他们连他的死活都不肯告诉我！这时，我只轻声地说，“我没什么意见。不过，他在哪儿？我怎么去呢？”

他们说：“这你就别操心了，我们会妥善安排的。一切你放心好了。”

队部的管教干事很和气地说：“那你回去吧，快收拾一下东西。”

我默默地退了出来。叫我放心，可我真能放心吗？F到底怎样了？又要把我送到哪儿去？……

显然，这不是恢复自由，而是转移地方。此时此刻，我感到最宽慰的是，胡风还活着，他们还让我去照顾他，这才是不幸中的万幸。我就这么迷迷糊糊地走出了办公室。

小厨房的炊事员还在命令我去给他找菜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回到住处，爬上了阁楼。这个20多人住的大房间，此时只我一人。我坐在靠窗的我的地铺上，望着我的箱子和被褥，还有一些乱塞在地铺角落里的零碎东西，心里乱糟糟的，真不知怎么整理这些东西。一些很旧甚至已经破烂了的東西，也得带走。谁知将来又会怎样呢？也许会弄得一贫如洗。什么都要考虑到。我曾听说，有一个犯人被叫走时，以为自己是去办手续要释放，就将所有的东西都送了人，不料却是去反省，几个月后加了刑又被送回来了，结果不但连吃饭的碗都没有，而受她东西的人睬都不睬她。这对我是一个教训。没有什么可乐观的，现今世事什么都可能发生，我要往最坏的方面去想。这一想，我倒有点舍不得我在这里刚刚建立起来的和大家和平共处的日子了。我曾在不平静的浪涛中飘荡，好容易小舟靠了岸，在这荒山中活了下

来，现在我将再一次伴随着我的亲人迎接汹涌骇浪。又悲、又喜、又惊、又惧，种种情绪涌上心头，我无心收拾东西了，只想倒头大哭一场！

已有人陆续下工回来了，有的从前面知道了消息，就来向我搭话，问长问短，我只好模棱两可地回答几句。有的人对我表示羡慕，“你熬出头了，可以出去了，我们……”有的还说，“你出去后一定会恢复工作又当干部的。”我只好苦笑笑。

指导员来了，告诉我不必着慌，明天一早派人送我去场部。

这就是说，我还得在这里住上一夜。

我去打晚饭，炊事员对我笑脸相迎，给了我满满的一勺菜。他们都说：“不要忘了我们呵。”我说，“忘不了的。这儿的玉米粑粑多香啊！”不知怎么的，这时我一点也吃不下去。倒不是我一下子就变娇了，而是心里实在堵得慌。

我们蔬菜组的伙伴们差不多都回来了，大家在卧室里闹哄哄的。她们知道我要走了，就都拥到我身边，向我亲切地表示祝贺。我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两三年，虽然有人曾对我不友好，但今天我对她们每个人都感到很亲切。这可能也是我吃不下饭的原因。这20来个人，每人都有一部

辛酸史（我与这些人的交往，我的这段经历，以后有机会，我将另文叙述）。种种原因使她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，坎坷的命运甚至使她们的人性被湮没，其实她们都曾是为妻、为人母的普通女人。在和她们长期接触的过程中，我感到了她们还有着不少善良的、真诚的感情，可惜那时的政策是刑满了并不能释放，因此她们仍是有家归不得。今天得知我要走了，她们当然以为我将一家团聚了。她们的祝贺我是理解的，也是感激的，只是我不能告诉她们，我的前途实际比她们的更渺茫！

这一夜，我在地铺上翻来复去，无法入睡。伙伴们的呓语声和各种声响，听起来是那么清晰，使我更睡不着了。周老娘忽然大声叫着她儿子的名字，又嘟囔地说着什么。我知道她在想儿子。她已经70多岁了，一心想回家同儿子见面，我曾代她写过不少次家书。明天我将怎样安慰她？是不是再替她写封家书？这能使她今后睡得安宁吗？……

我矇矓眈眈刚睡着，就听到了喊起床的哨子声。我习惯地一掀被子爬了起来。等我将一天内唯一的四两米饭拿回房时，看到周老娘在门口站

着。我很奇怪，她平日总是第一个独自上工的。原来她是在等我。我说，“要我写信吗？”“不，不是。我留下送你的。我就知道你会早走的，你和我们不一样。你是干部吧？”我不好回答她，只将碗里的饭拨给了她一多半。我说，“周老娘，你给我打的草垫子你拿回去自己用吧。你待我真好。”

喂猪班的陈××来了。她快生小孩了，我曾答应她找几件破衣服给小孩做尿布的。这时我就找出来给了她。别人都在望着我清理，我真不知如何是好。幸好这时派来给我背行李的人来了。他们每人抱了一件，还剩一堆东西就又找了个茶篓来一起装上。还没等我看清，他们就都背走了。原来这是一个美差，背的东西不重，赶早到场部，还可以在那儿玩玩、买买东西。我本来想叫同组的战××背一件，一路上可以和她说说说话、安慰她几句的（她和我一样是外省人，五个儿子的母亲，可是现在没有亲人认她了），但这已由不得我了。战××依依不舍地一直送我走到大路。天上正在飘着雪花，许多去上工的人都含笑向我点头。一直住在工地的黄家婆赶来了，她高兴地握了下我的手，轻声说：“我特意赶来送你的，你将来过上好日子，不要忘了我们啊！”我

说：“你好好保重，你也会好日子。最好提出回去探亲，看看老母亲吧！”她听了我这话，黯然神伤，只默默地向我点点头，就走了。她是一个去台湾的国民党中级官员的妻子，今天这一握手，尚不失贵夫人的气派。这个和我同岁的能干女人，我一直不能忘怀。

雪越下越大，我一个人往山下跑着。路两边的竹林和青草被白雪覆盖，虽然不象北方的雪那样一片纯白，但是白里透青，尤其是红红的水杈子傲然挺立其中，分外显出色彩的悦目！空气是那么地新鲜，我一点不觉得冷，只是沐浴在这清新中，忘了自己只是个转移驻地的特殊“犯人”，完全象过去一样沉醉在这难得的山乡美景中了。

到了场部，美景消失了，雪也停了。我被安排在场部的招待所里，一人一间房。送我的人将东西丢下早就走了。我清理了一下杂物，独自在那儿呆坐着。我已有五六年没到场部来了。这招待所是后来盖的，过去没有。想起那个深夜，我和F来到这深山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只是已如同隔世。如今，F，你在哪儿呀？

房门打开了，书记夫人带着一个矮个子干部进来了。她告诉我这是来接我的×干事。他客气

地向我打了招呼，我问他什么时候能走，最好早点走。他说正在联系车子，可能很快，叫我不着急。他还特地好意地告诉我，“张光人（胡风本名）身体很好。”午饭时，书记夫人陪我去食堂买饭菜，并特地关照炊事员，我不用排队。那两个老炊事员从窗口伸出头来，看到了我，点点头。我们刚到场部时，我常来打饭买菜，是老相识了。

三天后，已是元旦。我在这个苗溪茶场已不知不觉地过了七个年头了（1966—1973）。我一个人上食堂买了些过节的饭菜，索然无味地吃着。心里想着，我们的队里现正在分着麻辣鸡、炖肉和炸素丸子，这难得的美味佳肴，是用一年辛勤的劳动换来的，我的伙伴们现在高兴地吃着、说笑着。可我一个人在这里，举目无亲，甚至不能和伙伴们在一起。那个来接我的人已不在食堂吃饭，听说他先走了。那么，我还要在这儿住多久呢？日子可真难捱啊！书记夫人曾特地嘱咐我，不要一个人出去乱跑。我就只好在房里看那仅有的一份《四川日报》和呆坐了。

又过了一个星期，书记夫人把我叫去，说是要清理胡风的衣物。原来是要没收他的衣物书

籍，所以要将我的东西拣出来，每一件都要写上清单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1965年判决书上并没有没收胡风财物这一条啊。这时，我当然不好发问，但我多了个心眼，尽可能多要点东西算是我的。我要冷静地应付这不合理的决定。我提出，有许多书籍应该属于我，如《鲁迅全集》有一套是许先生送我的，马列主义方面的书是我要学习的；有些外国作家的名著是我买的，上面有我的签名……他们只好答应了。衣服，则说是旧的可以给胡风，那我也尽可能地多要了几件。其实说来也可怜，胡风实在没有什么家当，只有一套解放后我为他做的西服是新的，还值几文钱。还有许多零碎东西，我真不想要，但又不允许我将它们留下，就只好一起归我，由我带走。

听书记夫人说，这里要开三级会议，招待所人多不够住，更急于要送我走了。但那边又不来人，最后只好由场部派了车。

一天清早，所有的东西装上了一辆大卡车（书籍没有装）。书记夫人穿上一件崭新的公安制服，坐在司机旁边。有一家人硬要搭车和我坐在后面，但那里已坐了两个解放军，实在坐不下。这样，就发生了纠缠不清的纠缠。那家属在

争吵中甚至说，“犯人能坐我为什么不能坐？”我听了心里一阵酸楚。他们拦住车不让开。那男的还是一个队级干部呢，也和他的家属一样不讲理，硬说他老婆要赶回乡下去，非坐这车不可。书记夫人的威风也使不出来了。这场闹剧耽误了我们两三个小时，最后让他老婆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孩上了车，他和三个大的留了下来，我们才能开车。

汽车飞快地向山下冲去，芦山县城一闪而过。可惜这次没能见到那年深夜来接我们的姜场长和别的熟人。当然我没有告别的资格，但我在心里还是向这我住过近七年的山山水水告别：“再见了，再也见不着你们了，我逝去的年华！”

到成都时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我们住进了公安厅的招待所。

我和书记夫人在食堂吃饭时，那位家属也来吃饭了。书记夫人说：“你一个人，孩子呢？”“他睡了，我才赶快来吃。”书记夫人有意地说了一句：“你看你，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多不方便！叫你等两天全家一起走多好啊！”她不敢顶嘴，只低着头吃饭。我买了一个肉菜一个蔬菜，但吃不下，只吃了几块瘦肉，书记夫人也不能吃。我就将剩

下的都拨到那家属的碗里，说，“你带孩子，多吃点吧！”她感激地对我笑了笑。我心里舒服多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冒着毛毛细雨我们就动身了。车上除了两个不带枪的解放军外，添了一个小青年。这是公安厅一位干部的亲戚。那个家属留在招待所了。车开到成都郊外，开始下大雾，几米以外几乎看不清路。车开大黄灯慢慢地前进，不久又下起了雨夹雪，路滑得很，司机不得不下来在轮胎外挂上铁链条。这次行程真困难啊！我坐在车上，任雨雪淋着，眼望着空无一人的大路，真是只有雪花在为我送行。

天快黑时，到了南充城。那青年高兴地跳下车，向司机叔叔、书记阿姨道了几声谢，消失在人丛中了。可我们还得等渡轮。渡到对岸，直到八九点钟，才开进第一监狱的大门。我心里一惊，以为是到了地方。但是司机叫我们下车，要我们好好休息，说明天一早还要赶路。还要赶路？那赶到哪儿去呢？

在门外的会客室里等了好久，监狱的书记才从家里被叫了出来，把我们让进里面。知道我们还没吃晚饭，他又忙着张罗饭菜。吃了顿很简单的面条后，司机和解放军走了，留下了我和书记

夫人。这监狱的书记将我们送到客房休息。因为惦记着第二天要早起，直到一点多我才睡着。刚5点，司机就来叫我们了。我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。

在这大监狱，我没有看见一个犯人。早上监狱书记陪我们往外走的时候，我才看清，脚底下是水泥的小道，四周是花圃，还有凉亭。那个书记是河北口音，看去有50多岁，和我们的书记夫人似乎是老朋友，他们谈得很热乎。他又特意转过头来问我，“昨夜休息好吗？吃饱了吗？”这么和蔼的问话，使我不得不向他表示谢意。我用普通话回答他说：“很好。我十分感谢你的招待。”他说：“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”他的话语和态度，都使我想起了那位姜场长。

这该是最后一天了。但天气仍然是雨夹雪，道路泥泞得很。又正值赶场天，人特别多，中午只匆匆在路旁面馆里吃了碗肉末面。下午5点多，我们到了渠江边排队等船摆渡。好不容易进了渠县界内，正不知往哪儿走时，忽然从旁边车上跳下几个人，向我们司机问话。跟着，他们就跳上了车，一个为司机带路，另两个跳到后面，挤到我旁边来代替了解放军的位子，似乎是来接管我